



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与青年就业的观念演变

刘能



【摘要】改革开放40年，也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40年。社会结构性转型趋势、职业组织氛围和公共舆论的认知排序分别作为宏观、中观和微观结构性因素，共同形塑了各代青年人的就业观念。

【关键词】社会转型 青年 认知变迁 就业观念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就业既是一种重要的实质性活动，标志着个体可以通过一个经典的交换过程获得生存和生活资料，同时它也是一个重要的符号性活动，意味着个体在获得成人资格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个体可以在此基础上，建构自己的职业生涯并依此获得自己独立的社会地位，建构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每个个体的就业过程看起来各不相同，有着各自不同的轨迹，可能经历不同的故事，但他们也都会受到相似的外部社会力量的形塑。第一层结构性的外部社会力量是劳动力市场的整体情势；第二层结构性的外部社会力量是每个时代形成的对职业岗位的不同文化优先顺序，这些优先顺序有的以个人偏好的形式出现，有的则以舆论共识的方式出现，不但影响到青年填报志愿时的专业选择，也影响到其就业选择；第三层结构性的外部社会力量更加细微，那就是职业体系本身的结构变化：随着政策的变化、产业的演进和新的社会需求的诞生，从供给的一面来看，新的职业类型和就业方式也开始出现。

1980年代初期，上山下乡的知青返城之后，青年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国营企业的工人岗位，在当时应该说是一个很理想的结果，但在1995年到1998年国营企业改革之际，他们似乎构成了受到下岗、裁员和买断工龄政策影响人群中最主要的一类。1993年下海潮中抛弃稳定的“铁饭碗”前往海南、广东等地的沿海开放经济中去的弄潮儿，很多成了当代私营经济中的主力军。2002年的互联网泡沫，为之后的互联网创业铺垫了人力、

心理、情感和策略上的多重准备。2005年开始的创新经济口号，也在政策上和社会心理上，为后来的“双创”运动奠定了基础。最新的变化，便是一个所谓金融社会的兴起，又使得投资银行、国际评级机构、证券公司和互联网金融公司之类的新型“市场形塑力量”，成为年轻人求职的理想目标；而网红、网络主播/网络写手、新媒体运营和电商/微商等自由职业的出现，也为年轻人追求就业自主性和表达自己对垄断性就业组织的文化抵抗提供了机会。

1979年至今，如果从经济上进行分期的话，根据社会学家眼中的关键事件，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经济转轨的试验和过渡期（1979年—1989年）、迈向市场经济的系统转型期（1992年—2001年）、经济腾飞期（2002年—2009年）、经济模式转型期（2010年至今）。

经济转轨的试验和过渡期青年的就业观念：现代性、就业稳定性、加班光荣等

在经济转轨的试验和过渡期，就农村地区而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推行，农户重新成为生产经营的决策单位，私有产权概念得到保护和认可；农村生产力得到极大释放，剩余劳动力或者进入城市新兴开放经济领域（如深圳特区），或者进入乡镇企业。在城市地区，1984年深圳特区的建立掀开了

珠三角“三来一补”模式的工业化新阶段；城市地区的国营工业部门也逐渐开始了以经济效率为目标的初期改革试验；开始讨论承包制和中外合资企业的可行性，并进行试点工作。这一时期的一个副作用便是年轻人首次看到了虚拟经济的魔力：重要物资指标的交易带来了巨大的利润空间。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型已经带来了经济开放的各种尝试，冲击了原有的就业观和社会评价准则，使得新旧观念的碰撞冲击成为这一时期的常态。这一时期影响青年人就业观念的因素，从宏观结构上看，上山下乡运动后期的知青返城潮为城市就业格局带来很大压力；1984年社会治安严打战役的启动，标志着城市就业危机的持续；价格双轨制开启了特权阶级挖掘人生第一桶金的机会。从中观组织氛围因素来看，国营部门继续保持自己在国家资源分配格局中的优势位置；单位制/大院制塑造了国家中心或组织中心的职业生活；精英大学生获得了进入行政等级制中上层的开放途径；企业文化中仍然保存着强调集体主义价值观的组织遗产。从微观社会认知因素来看，收入差距开始扩大，非正式和非正统经济实践的地位开始提升；单位等级和组织特权的思想依旧根深蒂固。

因而，这一时期青年的就业观念主要表现为：重返城市性/现代性、摆脱失业/待业的污名、立业成家、就业稳定性/保障性、与国家的切近关系、牺牲个人生活（加班光荣）、成为万元户、成为先富起来的那一群人。

迈向市场经济的系统转型期青年的就业观念：失业风险、商海拼搏、自我认知等

迈向市场经济的系统转型期大致可以以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谈话为起点，以2001年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为终点，后者标志着中国全方位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之中。这一时期的主要经济事件包括：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极大地改变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地位）、1995年到1998年国营企业改制和1998年以来的福利市场化进程（1998年取消福利分房制度，开启住房市场化的道路；同年，开始缴纳医疗保险的试点；紧接着开始了教育收费制度的试点）。产权多元化方面，外商直接投资逐年增加，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开始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内部工资待遇的大幅提升也为优质劳动力的重新空间分配制造了一个巨大的心理动机。这一时期也孕育了中国互联网经济的早期发展，如后

来的互联网“三巨头”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都是在1997年开始成立的。大多数国人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拥有了个人台式电脑和手机。

这一时期影响青年人就业观念的因素，从宏观结构上看，一线城市的产权多元化和效率原则使得劳动力市场日益分割；单位制解体和逐渐推进的福利市场化改革逐渐改变了职业评价的基础。从中观组织氛围因素来看，对教育和人力资源领域的投资加强，中国开始初步进入证书社会；东北工业基地和传统工业城市出现密集下岗潮，出现企业倒闭和转制下岗和工龄买断等职业生命周期终止现象；企业加班文化：认同、融入和经济补偿并重。从微观社会认知因素来看，整个社会开始产生过时技能与应时技能的概念区分，人们开始改变自己对国营部门优势地位的原有看法；收入分化现象日益显著，导致个人启动自己的选择偏好，而社会网络中其他人的选择及其结果也开始成为个体职业决策的依据；住房、户口和单位福利差异主导本阶段就业考虑的理性选择过程。

这个分期，青年的主要就业观念谱系至少包括了如下的一系列特征：就业稳定性认知的改变（出现了失业风险的概念）和就业偏好的改变（商海拼搏和自我奋斗）；原先的集体主义劳动观则被经济补偿伦理所取代，当然，加班挣额外的钱对于家庭内部来说也还是一种重要的利他主义情结；可以说，对个体分化的职业能力和就业偏好的自我认知，是本分期内最为显著的一个就业观念。

经济腾飞期青年的就业观念：谋求高回报、实现自我价值、职业规划的短期化等

伴随着福利市场化的推进和中国经济文化日益融入世界主流（以中国成功承办和举办奥运会，以及中国GDP攀升为世界第二为代表），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腾飞。在这一时期的末尾，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劳动法颁布为分水岭，第二年（2009年）即出现了制造业的民工荒，不但标志着中国由制造向创造转型的国家战略初见成效，也意味着此前常被忽视的制造业劳动者的心理预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此同时，房地产市场于2006年开始进入价格高速攀升的轨道，这一生活方式成本高企的趋势，又对高度城市化地区劳动力的动机体系产生了巨大冲击，用一个俗语来讲，便是“丈母娘的刚需”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青年英才的职业规划选择。这个阶段，青年人才向



互联网经济聚集，也带动了互联网领域中小企业的创业浪潮。

这一时期影响青年人就业观念的因素，从宏观结构上看，中国互联网经济进入高速稳定增长周期；2005年开始的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国家战略转型，为10年后的“双创”奠定了初步基础；1985年后出生的人群开始大规模就业，中国劳动力市场迎来一批与众不同的新生力量。从中观组织氛围因素来看，互联网和新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企业组织的革新：小型创新企业大量出现，扁平化组织模式和新兴企业文化方兴未艾；灵活就业的其他模式开始出现：劳务外包、实习制度和自由职业；劳动力市场对求职者的评价开始引入外部标准（如就业经历、跳槽次数），并更多借力于猎头市场。从微观社会认知因素来看，一线城市房价从尚可承受的低点向远高于固定职场收入的高位价格的变动，使得追求高货币收入成为青年求职者的重要动机；一度出现大学生“眼高手低”的社会认知。

这个分期青年的就业观念主要包括：在新型经济实践中谋求高回报的收益、实现自我价值、职业忠诚感的两面性：一方面，企业文化建设推进职业忠诚感；另一方面，制度化的跳槽现象也揭示了特定产业内自我价值的新型实现方式。高房价挤压下，短期职业规划和职业动机替代了长期规划，短期收入效应的作用更加显著。

经济模式转型期青年的就业观念：平等自主、自我成长、创业创新等

从2010年开始，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势头直线上升，互联网进入手机移动端主导的阶段，平台生态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人网开始衰弱；微信系统在腾讯内部取代QQ系统；独角兽企业风起云涌；短视频和快速新闻消费成为新的增长点。2009年年底开始的“双十一”活动揭开了电商时代的序幕。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提出，青年人的就业实践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与他们个性日益加强的代际特点相符合，更多职业发展上的自主性成了就业观念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阶段整个经济模式的转型，还体现为GDP增速的逐渐减缓，环境保护政策和土地利用执法实践（卫星监测）的严格化，由此意味着中国进入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放低些速度，增加点质量。房地产价格在一线城市继续飙升，对青年人的职业规划选择继续造成重要影响；金融业中的投资、资产管理和理财部门，作为高薪代表行业受到青年才俊的追捧。与此同时，境外就业

和国际组织就业也开始进入年轻人的视野。

这一时期影响青年人就业观念的因素，从宏观结构上看，作为高成长的职业领域，互联网经济和其他高端服务业联合推动了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和专业技术培训的专业阶级的形成；随着中国战略型企业在全球配置资源，就业领域也出现了国际化趋势：海外就业和海外人才国内就业成为新趋势。从中观组织氛围因素来看，“双创运动”将自我实现这一价值理念从一个集体性的场景中，转移到一个个体性的场景之中；企业文化建设的焦点，从忠诚感转移到职业人力的全面发展。从微观社会认知因素来看，整个社会的就业理念出现新的分支，高风险和高回报的就业模式开始进入社会认知的选项；高竞争部门/行业内的个体跳槽和团队跳槽，持续成为职场待遇和地位改善的一个主流策略；随着教育体系内人才供给量的增加，社会出现“刚毕业即失业”的认知，“啃老”成为家庭代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形态。这一时期青年的就业观念主要包括：从自我价值实现，进一步提升为以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自我价值；更加注重职业场域的平等、自主性、参与度和决策权利；职业场所的自我成长和发展空间；劳动者权益保护；创业和创新；收入和价值成正比；工作生活和业余生活并重：最好不要加班。

这个分期内，中国年轻一代的就业观念迅速实现了国际化和全球化：充分的自我价值实现和员工职业潜力的完整发挥成为衡量企业文化高低的重要标准。明星企业家及其所表征的企业家精神的社会扩散，成为当代中国名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高等教育体系内围绕就业和未来职业规划出现了一些新变化：“间隔年”概念开始形成，表明个体希望以更为自主的方式规划人生；而实习实践的普遍化，则意味着个体更愿意提前习得并遵循劳动力市场的职业规范；职场自主性、自我价值的充分实现、劳动者权益保护和业余生活的同等重要性等新型观念开始主导青年一代的就业心理和动机。人民编译

（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教授、博导，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参考文献】

①《创新创业拥有更高“含金量”》，《光明日报》，2018年10月11日。

责编 / 赵橙溶 美编 / 史航